

物质形态与文本意义：麦肯锡文本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述评

李明杰 李瑞龙

摘 要 以齐马提出的文本“互文性”为基础,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强调文本包括书籍以外的其他非书籍的物质形态,而这些物质形态保存了人类社会的印刷、阅读、收藏和校订等活动中留下的各种印记。对文本物质形态的制作及使用过程的历史考察,构成了实物目录学的重要内容。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将文本的物质形态与文本意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跨越了目录学和文学批评的界限。一方面超越了以格雷格为代表的只关注文本内容的“纯粹”的目录学理论;另一方面指出研究文本形式的表达功能对文学批评的价值。在研究方法上,麦肯锡针对目录学界长期习惯使用的归纳法在逻辑上的不足,提出以演绎法取而代之。麦肯锡文本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对欧美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 23。

关键词 麦肯锡 文本社会学 实物目录学 文学批评 演绎法

分类号 G256.1

Material Forms and Textual Meaning: Review of Donald Francis McKenzie's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Sociology of Text

LI Mingjie & LI Ruilong

ABSTRACT

In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ing, McKenzie's sociology of texts is a widely accepted theory. This theory mainly stemmed from bibliography but assimilated ideas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 Annales and Saussurean Linguistics. Basing on Zima's intertextuality theory, McKenzie's sociology of texts thought emphasizes that the material forms of books and non-book texts both as texts contain marks of printing, reading, collection and revision. This theory has combined the physical forms and meaning of texts, associated bibliography with literary criticism, and broadened the research field of Physical Bibliograph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it opened up a new school of history of book and reading study that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readers, physical forms and meaning of texts in the 1980s to the 1990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of printing process in the 17th and the 18th centuries in England, McKenzie concluded the principle of printing as “concurrent produc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printing process was in a complex and highly volatile contexts, and this principle should apply to production of all kinds of texts. McKenzie's sociology of texts transcended the “pure” bibliography. Some bibliographers like Greg concerned only the symbolic meaning within texts,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fixed, and their study excluded the affections which were not from authors. However, McKenzie stated that if a medium in any sense effected a

通信作者:李明杰,Email:limingjie@whu.edu.cn,ORCID:0000-0002-1876-9040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LI Mingjie,Email:limingjie@whu.edu.cn,ORCID:0000-0002-1876-9040)

message, then bibliography could not exclude from its own proper concerns the relation between form, function, and symbolic meaning. Furthermore, the texts McKenzie studied were not only written or printed signs on pieces of paper or parchment, but also oral, visual and digital forms. All forms of texts could be object of bibliography. At the same time, sociology of texts claimed the role of physical forms in literary criticism. Before McKenzie, literary criticism mostly considered texts as self-contained, which could reveal themselves. So texts were always studied separately, or with a specific element like authors or readers. This study could not reveal the structures and connections within texts. McKenzie thought that except for texts themselves, authors, readers and text forms also mat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extual meaning. He tried to associate bibliography with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omot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exts.

Along with the new idea of “concurrent production”, McKenzie also suggested that bibliography needed a new methodology. He thought that as a bibliographical methodology, deduction applied more than induction. Bibliography was characterized by multiple and ingenious hypotheses, and a narrow range of theories was less likely to embrace the complex possibilities of organization within even a quite small printing house. Truths derived by induction were always vulnerable and subject to modification when new evidence came to hand. With deduction, distinctions of different cases may be entertained, and the hypothetical nature of bibliography could be retained. By insisting on the rigorous test, deductive procedures would bring a healthy critical spirit into the subject.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McKenzie’s sociology of texts based on McKenzie’s book *Bibliography and Sociology of Texts*, a collection of his essays *Making Meaning: “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 and reference to relevant studies of other western scholars. 23 refs.

KEY WORDS

Donald F. McKenzie. Sociology of texts. Material bibliography. Literary criticism. Deduction.

0 引言

文本社会学 (Text Sociology) 原是一种文学社会学批评理论,最早由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皮埃尔·V·齐马 (Pierre Václav Zima) 1980 年在《本文社会学》^① (*Pour une sociologie du text littéraire*) 一书中提出,其精义在于立足文学作品本身,以语言为中介来考察文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该理论汲取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克里斯特娃符号学的研究成果,试图在文本与社会之间、文本各层次之间、文本生产与接受之间、文类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建立互文性,而这种互文性被称为文本社会学的理论之

核^[1]。所谓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亦译作“文本间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相互碰撞、作用从而产生新的意义”^[2]。这里的文本不仅包括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书面文本,也包括以其他媒介为载体的文本,如电影、绘画、音乐和建筑等,几乎涉及所有的文化领域。

文本社会学因其从互文性的角度看待文本与社会意识及其他诸多文本之间的关联,使得传统的学术研究获得了更为宏阔的视野,故在产生后不久就成为西方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也对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阅读史是书籍史的一个分支,而书籍史是目录学、文学批评、社会文化史的交叉学科。在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中,目录学、文

① 原译为“本文社会学”,但后来一般译为“文本社会学”。为了尊重初译本,此处沿用“本文社会学”。

学批评、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彼此杂糅,不同的学科相互借鉴。文本社会学的提出,启发了西方学者将文本的生产与消费、创作与接受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西方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的特色,麦肯锡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 麦肯锡文本社会学思想的产生

麦肯锡(Donald Francis McKenzie, 1931—1999),新西兰人,毕业于剑桥大学,曾在新西兰的大学担任教职。1962年,他在新西兰创建Wai-te-ata出版社,这段印刷商的经历对他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助益匪浅;1975—1976年,在剑桥大学担任临时讲师,教授目录学;1986年赴牛津大学任教,为英语系的研究生新生教授目录学,后成为牛津大学目录学和文学批评的名誉教授;1988年获得马克·菲奇目录学奖(Marc Fitch Prize for Bibliography)。麦肯锡在牛津大学的教学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本生产”,包括现存文本的档案、生产文本的劳动力、形成文本的材料、文本生产的过程和技术,以及描述各种文本的方法;二是“文本社会学”,主要指导学生通过一些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案例,探索文本的生产环境和其中产生的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

通过出版、教学实践,以及对前人研究的总结,麦肯锡认识到,对于书籍生产环境的知识的扩展,导致了对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提供的真理的怀疑,但是这个扩展也涉及学科本身。“首先,由于书籍生产的情况比人们认识的更为复杂,这使得这门学科摆脱了归纳法的限制,目录学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推测和假设。第二,对制造文本及其多重意义的复杂环境的复原,驱使学者调查历史环境中更宽广的圈子。比如在十七世纪的伦敦,对图书进行分割,以使得几个印刷铺可以同时进行生产。这种复杂性使得如果想要理解生产的确切情况,需要将贸易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第三,它将重要的注意力指向书籍中决定意义的其他形

式的视觉证据,尤其是根据主题选择字模的尺寸和字样风格,为了澄清或者强调而对页面进行的布置,空白和装饰的功能,格式和纸张质量与流派和阅读的关系,等等。”^{[3]3-4}基于目录学研究和实践的这些变化,麦肯锡认为对文本的考察不能仅限于内容,还应关注物质形态的书籍的生产、传播与被接受过程,因为文本意义的构成与作者、印刷商、书商、读者等群体都有关系。这与齐马的文本社会学思想不谋而合。

麦肯锡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专著《目录学与文本社会学》(*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British Library, 1985)和论文集《制造意义:〈思想的印刷者〉及其他论文》(*Making Meaning: “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此外还有一些散见的论文。在《目录学与文本社会学》中,麦肯锡分别论述了在书籍形式和非书籍形式文本中,物质形态对表达文本意义的作用,其贡献尤其在于将人性化的因素重新纳入美国学派所研究的目录学中,强调排字者和付印者的作用(如创意、职业行为、无意中犯下的错误等)。《制造意义:〈思想的印刷者〉及其他论文》是由麦肯锡的学生彼得·麦克唐纳(Peter D. McDonald)与米歇尔·苏亚雷斯(Michael F. Suarez)所编,收录了麦肯锡关于目录学和书籍史的主要论著。书中包括三个主题:①目录学(Bibliography),收录3篇研究十七、十八世纪印刷铺工作流程的论文;②书籍贸易(The Book Trade),收录3篇研究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与法国书籍贸易的论文;③“文本社会学”,收录研究文本形式与文本意义的关系的论文。

2 麦肯锡文本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麦肯锡文本社会学的创新性,在于将文本的物质形态与文本的意义联系起来。他主张文本研究一定要考虑文本意义以外的因素,文本的形式也有表达意义的功能。他通过对典型案

例的分析,如维姆萨特(W. K. Wimsatt)和比尔兹利(M. C. Beardsley)对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诗歌的引用错误、加兰版《尤利西斯》(Ulysses)的排版和谋篇布局、《圣经》章节安排对内容的分割,证明了文本意义的表达与物理形式有关,而且是由不同群体的阐释行为构建的,受到的影响来自作者、编辑者、印刷者、读者等群体。

2.1 “编织”不同物质形态的“文本”

麦肯锡通过对“文本”(Text)一词在拉丁语、吠陀梵语、希腊语等不同语种中的词源分析,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如同编织物一样,文本是由文字编织而成的,这是来自词源的隐喻性含义。他进而将“文本”扩展到新的物质结构、非书籍形式的文本,包括口头的、视觉的、数字数据等,如音乐、声音、视频、计算机储存的信息,甚至于地形地貌也具有文本意义,比如地图等。

文本不同的物质形态以及其中包含的意图,都与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相关。文本的意义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读者对文本总是采用不同的阅读方式,这种方式由文化背景决定。最早接受一部作品的读者和作家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使用共同的语言,依据类似的模式思维。但不能与作家的世界直接接触的读者,则以自己的方式对作品进行重新阐释和理解。这些对作者创作时的实际意图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可能挖掘出作者自己未曾意识到的作品的潜在意义,或者增加一种预料不到、甚至可以代替原意的新意义。

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意义形成了作品的历史身份。在传播过程中,文本物质形态的改变,不再体现初始的制作意图和意义,形成了构建意义时的背景。同时,由于文本的每个版本的历史特性不同,阅读因此有了独创性和多样性。书籍史,包括阅读史,就是文本被“误读”的历史。从这一观点中可以看到前人对麦肯锡的影响,如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阅读社会学理论^[4]、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文本不确定性

理论^[5]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文本留白理论^[6]。

2.2 封闭与开放:不同文本形态的阅读结果

由于文本的意义和读者的阐释之间存在差异,麦肯锡将文本概念分为封闭式的和开放式的两种。封闭式文本(Closed Text)是自足的、由作者定义的,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封闭式文本来自历史学,它追求按照文本的物理性证据,尽可能客观地重建它对于首创者的意义。实现这个目的,可以借助作者的本意、文本传播模式的表述功能、受众的接受能力等因素来复原。这就是文本批评要求的“真实的”文本,是作者所意图的文本,而非有缺陷的版本。这种复原需要依靠学者的文献整理工作来实现,但与实际的阅读情况可能是不相符的。

开放式文本(Open Text)的意义元素总是不完全的,因此是开放的、不稳定的,其意义不是确定的,是借助于读者、表演者、观众等不断重新创造而产生的。文本的物质形态及其意图,都和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相关,因而不会有绝对不变的意义。文本的改变和调整正是其生存的条件,正如对文本的创造性应用是它们被阅读的前提。封闭式文本是暂时的,开放式文本才是永恒的,任何文本本质上都是开放式文本。分析目录学校订一个文本,似乎是复原了一个理想的、稳定的封闭文本,其实也是一个再造过程,结果也是一个开放式文本^[7]。

在分析文本形式对文本意义的表达与影响作用时,麦肯锡对多种类型的文本进行了案例分析,包括绘画、电影、地形地貌、地图、戏剧、电子数据等。最为典型的是对印刷术进入新西兰毛利人部落的历史和产生的影响,以及对英国殖民者和毛利酋长之间达成的《怀唐伊条约》的研究,麦肯锡提供了一个因印刷文化与口头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读,进而引发冲突的案例^[8]。

2.3 文本“并发生产”原则及社会学意义

麦肯锡发现,文本的生产不是一个理性、一

贯的生产方式。通过对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印刷活动,如剑桥大学和威廉·鲍耶(William Bowyer)的印刷铺的运作情况的调查,他发现当时印刷铺中的工作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人可能同时进行几本书籍的印刷,几本书籍同时被生产出来,工人和印刷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关系。排字工和印刷工作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上是平衡的,但如果说这种平衡在任意一本书上都是必须的或可能的,则是错误的。不同的进展在印刷工作的组织上被赋予了很大的灵活性,麦肯锡将这种生产方式称作“并发生产”(Concurrent Production)。显然,法国年鉴学派量化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影响了麦肯锡对文本生产的认识。法国的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以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书籍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模型,比如作家群体的更新换代、作家的出身、一个国家的作者人数和生产能力等。麦肯锡提出“并发生产”原则,即是基于对印刷活动的档案文献的统计分析,如印刷书籍的标点、字体,内容的修改,负责的排字工和印刷工等信息。

而且,麦肯锡认为印刷只是文本传播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印刷经常被视为改变社会的媒介,但麦肯锡指出,印刷的重要性可能被过分强调了。即使是在读写的社会,口头文本和图片并未被印刷取代,而是持续并存,甚至在印刷技术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原有的地位。这种恢复借助于新技术得以实现,比如电报、照片、电话、留声机、电影等。各种新的载体,如电视、磁带、光盘、电脑,以及其中存储的文本,这些新媒介累积的力量,在未来是不可忽视的。

“社会学”(Sociology)是由奥古斯都·孔德(August Comte)在1830年创造的新名词,指“新的科学,称作社会伦理学,或社会学”。1873年,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中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聚集体的成长、发展、结构和功能。”^[9]对于结构和功能的强调,要求社会学研究必须关注印刷媒介所服务的社会现实的范

畴,关注与人类的动机有互动关系的文本的生产、传播、消费等环节。而麦肯锡认为,这些事实是传统的目录学家和文本批评家所忽视或无力应对的,此类研究必须联合藏书家、编辑者、图书馆员、历史学者、读者等群体来共同完成。

2.4 基于文本社会学的目录学思想

通过考察编辑者、印刷者等群体在文本传播、文本内容及形式改变过程中的作用,麦肯锡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我们在阅读时,所读的文本是作者的文本,还是印刷者、出版者的文本;真正的阅读是不是需要同时了解作者、印刷者、演员和出版者的相关情况;一些特殊的文本,比如为表演而写的戏剧文本,通过视觉性阅读能否获得演员口头传递所包含的意义。文本在传播中,都会经历“传输损耗”。不仅文本传播的过程被扭曲,即便是文本呈现的形式,也更多地体现出当前而非既往的意义。因此,为了追寻文本的历史意义,目录学家需要关注书籍的物质形态的特征。作者、文学、社会环境等,都与文本的再阅读、再编辑、再设计、再印刷、再传播有关。在此基础上,麦肯锡提出了自己的目录学理论。

第一,目录学致力于描述所有的文本记录。目录学是综合性、无差别的。无论是针对一个国家由呈缴本组成的文本集合,还是国际的文本网络,目录学原则都一律适用。针对特定的主题、目的或者文本集合的目录学,是这个普适的目录学控制的典型形式。目录学使得两个文本之间的关系(互文性)被发现成为可能——无论何时、何地、什么形式。换句话说,目录学是我们建立任何一个文本的独特性以及发现这个文本所有互文维度的方式。

第二,文本的物质形态具有传递意义的功能,目录学的工作应包括对文本的物质形态进行记录和解释。这一解释的功能弥补了纯粹语言分析的缺陷。原则上,不仅在印刷书中,而且在几乎任何文本的传播模式中都能实现这一功

能。因此作为一门学科,目录学与可记录、可识别意义的结构都是相关联的。

第三,目录学平等地接受新的文本和它们的形式结构。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不同版本的文本的合并,从旧的文本中产生新的文本。而系统化的结构,比如档案馆、图书馆、数据库,则是另一种案例。在每个案例中,它们被构建所依据的元素都是目录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目录学本质上关注作为社会产物的文本。人类及其制度的产物、消逝的过去,以及此时此地的动态,使得我们认为在“文本社会学”这个短语中可能会发现一个关于它确切范围的有用的描述^{[3]61-62}。

3 麦肯锡文本社会学研究方法:从归纳到演绎

除了提出自己的目录学理论,麦肯锡还对目录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当时的目录学家大多使用归纳法进行研究,而这种基于经验的研究方法,将学者的知识局限在从直接观察所得到的推论中。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从有限的观察中归纳出来的推论,无法被证明是正确的。很多学者曾经讨论过归纳法的缺点。英国的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曾表示,归纳法只是一个进行貌似合理的推测的理论。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即使观察到所有对象的共同点,也没有理由对超出我们经验以外的事物作任何推论。再多的正面证据也无法确证一个假设,但是一个反面证据,则可以否定一个假设。哲学家卡尔·波普尔(Sir Karl Popper)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归纳法在逻辑性上的不足:无论我们观察到多少白天鹅,也不能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从单个的案例中推测普遍的论断,这样的方式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可能是错误的^[10]。

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对目录学界常用的归纳研究法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比

如鲍尔德(R. C. Bald)认为,如果人们所理解的“精确”科学是通过实验和观察得出结论,并且能够重复实验的环境,以重复和检查结果,那么目录学无论如何都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麦克柯罗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补充道:“从不确切、不完整的数据中所得来的科学性的准确,是一种假象。从这个假象中,我们不会得到什么,但可能会失去很多。”^[11]

从个案归纳中得出的普遍规律,在新的证据面前都是脆弱的。而且提供的个案越少,这种危险性就越大。有意思的是,归纳主义者都会承认自己所用证据的不完整性。当新证据出现时,归纳而来的结论就会处于被调整的状态。这就是说,归纳出来的“真理”是假设性的,等待着被证伪的,亦即意味着知识是和反驳共存的。归纳出来的结论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可靠”或“有可能的”,这样的结论以对证据的完整性的假设,以及已过去的案例或者“正常”的案例在将来的可预测性为前提。当结论受到反面证据的威胁时,归纳主义者会退回到某种历史相对主义之中。因此,一个范畴狭窄的理论,是无法应对书籍印刷工作中的复杂性的。为了应对书籍印刷中的复杂情况,目录学研究需要进行多重和独创的假设,但这些假设不能被当成确定的“真相”。

针对归纳法存在的以上问题,麦肯锡提出以演绎法取代归纳法。他认为,目录学家应该变得越来越关注追踪复杂关系,而非结论性的论证。早期印刷铺的生产状态显示出一种多样性,对这种多样性的研究需要大量的假设,归纳法往往将这些假设视为确定的“真理”。演绎法则通过坚持对假设的严密论证,为目录学带来健康的批评精神。保持目录学倾向于猜想的本质,会使目录学的发展加坚实。由于文本的生产状况是极端复杂、不可预测的,目录学家应该通过假设演绎法推进调查,以发展出一个坚实的、能够容纳细微差别的理论。由于演绎法对逻辑异议是开放的,所以能够接受确切知识中存在推论的部分。

4 麦肯锡文本社会学的学术史评价

麦肯锡文本社会学的提出,是对当时欧洲语言学、目录学理论以及目录学研究方法的回应,其中与之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索绪尔语言学和以格雷格等人为代表的实物目录学。

4.1 对索绪尔语言学的借鉴

瑞士人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是20世纪著名的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被人们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把语言现象分为语言、言语和言语行为三个层面。言语行为具有复杂的性质,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心理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因素。然后从中抽离出一种纯社会性的客体——交际所必需的整个约定俗成的系统,即语言。语言是个人被动地从社会接受而储存于头脑中的系统,是人们进行沟通时的各种表达的符号。它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是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具有的,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具有交流功能、符号功能和概括功能^[12]。语言和言语互为前提,紧密相连,但是又绝对不同。语言与言语的二分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核心。

索绪尔将语言放在时间和大众的背景中,指出语言系统对于使用者的强制性,即语言的不变性,以及语言随时间的推移发生缓慢而连续的变化,即语言的可变性。基于此,索绪尔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受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将共时研究置于优先地位,强调共时语言学单位的价值取决于它所在系列中的地位而不是它的历史。语言学家必须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系统描写清楚。语言的演变都是个别要素的孤立的变化,要确定要素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只能从共

时的状态中去把握。

麦肯锡认为,索绪尔语言学以及基于此的结构主义理论,强调纯粹的共时性分析,即人类如何对话。对口语优先的坚持,使得注意力被集中在言语结构。其他形式的语言,或者说书写语言——图画、代数的、象形的,还有最重要的——印刷的,由于不是和口语相关的,则被从文本阐释的讨论中排除掉了。对共时语言学的重视,将写作贬低到非决定性的地位。旧的、基于文本的、文献学的、对语言的历时性研究被对口语的研究取代。索绪尔语言学这种脱离历史过程的研究,产生了一个结论:我们不能从书写或者印刷的文本中,重建作者的声音,或者作者倾向的意义。而从共时性结构中,我们并不能确定文本意义,而是得到共识所推论出的意义^{[3]33-34}。

针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麦肯锡一方面赞同文本意义的不稳定性,认为文本的研究需要将文本意义之外的问题包括进来,而文本的意义不是固定的,是由写作、设计、印刷书籍的人,以及购买和阅读书籍的人的解释行为共同构建的;另一方面,麦肯锡重申了文本表达意义的作用。他所称的文本形态包括视觉的、听觉的、口头的,甚至计数的在内,其载体包括地图、印刷品、音乐、音频档案、视频,以及计算机储存的信息等类型。从金石文献到唱片目录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看作文本。从文本传播的技术和社会过程的角度,还要研究非书籍形式的文本、文本的版本、传播技术、被理解的意义、社会影响等。

4.2 对“实物目录学”的发展

(1) 西方“实物目录学”的由来

西方目录学从总体上可分为两大分支:一是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Enumerative or Systematic Bibliography,又译为列举书志学),即研究按照一定的系统化规则编排图书或其他文献的学问,其目的是将有关的图书或其他文献的信息汇集成一个有用的逻辑系列^{[13]101},具体成果主要有藏书目录、贸易书目、著者书目、专

题书目、联合书目、国家书目、世界书目等;二是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 (Analytical or Critical Bibliography, 又译为分析书志学), 即研究作为物体的图书, 其目的是精密、准确地鉴别和描述文献^{[13]100}, 从中又发展出各种分支的目录学, 后世统称之为“实物目录学”。

20 世纪之前, 西方目录学研究更多的是以列举目录学的形式呈现, 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7 世纪亚述尼尼微的塞纳彻瑞布 (Sennacherib) 图书馆编制的泥板文书目录。纵观其历史, 中世纪宗教藏书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如第一部联合目录诞生于 1410 年前后, 即由本笃会修士波士顿 (John Boston) 编撰的《基督教手稿目录》(Catalogus Scriptorum Ecclesias), 著录英格兰和苏格兰共约 180 个教堂的藏书; 最早按主题编制的著述目录产生于 15 世纪末, 即由斯蓬英男修道院院长特里森 (Johann Tritheim) 编撰的《基督教教士之著述》(Liber de Scriptoribus Ecclesiasticis) 和《德意志名人著述目录》(Catalogus Illustrium Virorum Germaniae)。特里森本人也因此被誉为第一个真正的具有目录学思想的学者。

15 世纪中期西方印刷术发明后, 经过近百年的应用和普及, 再次有力地促进了列举目录学的发展。16 世纪也出现了几部代表性的书目, 如 1545 年德国医生格思纳 (Conrad Gesner) 出版的《世界书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 著录大约 12 000 部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的写本书和印本书, 全部按照著者姓名字顺编排; 1548 年编年史学家和剧作家贝尔 (John Bale) 编撰的第一部国家书目《不列颠 (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 名人著作目录》(Illustrium Majoris Britanniae Scriptorum hoc est Angliae, Cambriae ac Sotiae Summarium), 亦按作者英文姓名字顺排列。书籍贸易的发展, 使得德国的法兰克福和莱比锡成为重要的图书集散地, 并出现了大量由书商编制的图书贸易目录。至 18 世纪, 西方的很多图书馆都编有自己的馆藏书目, 目录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公认的知识领域。19 世

纪的目录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 目录学期刊和目录学学会也相继出现。

到了 20 世纪, 许多目录学家开始转而从从事图书生产全过程的研究。这种“新目录学”能够澄清从作者手稿到印刷本图书过程中有关文本传递的特定文献问题^{[14]8}, 这就是所谓的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分析目录学或校雠目录学的分支学科, 包括文本目录学 (Textual Bibliography, 又译为文本书志学)、描述目录学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又译为描述书志学)、历史目录学 (Historical Bibliography)、实体目录学 (Physical Bibliography) 等。这些分支学科的侧重点不同, 但指向的基本是同一对象, 即作为物体的图书的生产与传播过程, 因此有学者将它们统称为“实物目录学” (Material Bibliography)。

(2) 麦肯锡对西方“实物目录学”的拓展

西方目录学在产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 如中世纪修道院图书馆编制书目主要是为了登记财产之用; 文艺复兴和活字印刷术普及之后, 书目又承载了为书商推销图书的功能。而对于古书收藏者和研究者而言, 他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书籍的内容, 还包括它们被印刷出来的方法、问世的情形、书商的真实身份等。在他们眼里, 这世上就没有两本完全相同的书, 就像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因为同种图书的不同版本, 即便有相同的文本内容, 还可能有不同的副文本信息和物质形态, 比如留下的藏印、题跋、批校等使用痕迹, 特殊的装订形式、不同的流传经历等。因此, 书目的功能开始倾向于将一部作为研究对象的书籍看作是它自身历史以及它所承载的文本的信息来源。这种让研究对象自身说出自己秘密的方法, 是实物目录学的精义所在。

Bibliography 在英语国家 (尤其是英国) 有比较特殊的含义。它不仅是书目的简单汇集或文本分析, 还要利用印刷史和技术史知识确认书籍的真实性, 判断准确的印刷日期和地点, 检查一切可以发现书籍的实物来源的细节。因此,

“在很多情况下,Bibliography 包含了书籍史,甚至文献史”^[15]。实物目录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格雷格(Walter W. Greg)、波拉德(Alfred W. Pollard)、麦克柯罗(Ronald B. McKerrow)、鲍尔斯(Fredson Bowers)等。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针对作者莎士比亚的印刷本,以及1560年至1630年间的剧作艺术,以确定这些版本与原稿之间的关系^[16],其中格雷格提出的“底本原理”广为人知。他认为目录学关注的是带有特定的书写或印刷符号的纸张、羊皮纸或其他载体。目录学家将这些符号看作是随机的标记,并不关注符号的意义。

早期的实物目录学理论认为,书的物理特征只是制作人留下的痕迹,反映的是制作工序和方式,没有表述功能和象征意义。如鲍尔斯认为,一本书的物理特征“在形状的秩序和形式上是很重要的,但对于象征意义是无关紧要的”^[17]。印刷是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文本的意义也是固定的。持这种理论的学者只寻求文本的本来含义和作者的真实意图,检视原稿的修订情况。而作品流传过程中作者以外其他人的介入,如印刷者、编辑者、校对者、书商等,都被视为“污染”过程的一部分。学者们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建立一个最完整、最少受到“污染”的版本。

麦肯锡在1969年发表的论文《思想的印刷者》(*Printers of The Mind*)中反驳了以上观点。他认为,书籍是复杂、高度不稳定环境中的人类产物,格雷格的理论回避了文本的不确定性。这种目录学只对手稿、印刷本等形式的文本进行记录和比较,将目录学局限于研究非符号性意义,忽略其对解释性结构的依靠,遮蔽了人类活动的角色,也否认了目录学与书籍史的联系,最终将阻碍其发展成为一门学科。麦肯锡通过对16至18世纪印刷活动的研究,提出“并发生产”的原则,并确立了自己的目录学研究范畴:目录学研究的是记录形式的文本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过程。除了格雷格所说的纸或者羊皮纸上的符号,目录学家还应该关注形式对于意义

的影响。麦氏对目录学范畴的阐释,使我们能够通过目录学描述文本传播的技术以及社会过程,包括非书籍形式的文本的物质形态、文本的版本、技术传播、制度控制、被感知到的意义以及社会影响等。

随着目录学实践的深入,格雷格的理论已不足以描述目录学的概念和功能。一些目录学家尝试拓展目录学的定义,使格雷格范围狭窄的理论与目录学的发展相协调。如坦瑟勒(George Thomas Tanselle)将目录学定义为“关于一个术语的一系列相关的学科”^[18];鲍尔斯将目录学划分为列举目录学或系统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分析目录学、文本目录学和历史目录学^[19]。这些学者尝试扩大目录学的类型,将格雷格的定义转变为面向分析目录学的定义,避免这个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对书籍生产的社会和技术环境的研究,是历史目录学的范畴。有的学者认识到了历史目录学的作用,但并不将其视为目录学的主流。如鲍尔斯认为,对于书籍的印刷及其流程的关注,对分析目录学来说只是辅助性的。罗斯·阿特金森(Ross Atkinson)也认为它们是技术史或者信息科学的一部分^[20]。但麦肯锡主张,如果文本形式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信息,那么目录学就不能不关注文本形式、功能和符号意义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其他类型的目录学都无能为力,除非把对书籍及其制造和使用过程的历史考察涵盖在内。因此,麦肯锡主张的目录学研究范围包括:①作者、印刷者、出版者对文本的创作、形式设计和印刷传播;②批发商、零售商和教师在不同社群中对文本的分配;③图书馆员所作的收集和分类;④文本的意义及读者的再创造。这样的目录学将书籍的生产过程、技术环节和社会动态,以及读者或者整个图书市场的传播和接受都囊括其中,构成了书籍史研究的整体内容。

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理论,为目录学加入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元素,拓宽了目录学的研究领域。对于目录学的各个分支学科,麦肯锡最

重视历史目录学的研究。他认为在列举目录学、描述目录学中,书目的条目都是象征性的,代表着所描述的对象。文本目录学也是一样,寻求根据内容对所描述对象的重现与复制,以细节中的最大精确性来复制对象。这三种目录学组成了一个三层结构的指示性的标记系统。但是这类研究对于解释书中的符号和标记是无能为力的。对文本形式、功能和符号意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需要解释一本书中的标记,而非描述或复制。这样的目录学分析,要依靠先前的历史知识,因为它只能“和先前搜集到的关于图书制作技术的信息”^{[3]11}一起运作。这类研究要依靠对于图书及其他文献的制造和使用的历史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录学家需要转向其他的学科,而是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学,尤其是文化史,产生了对目录学的需求。麦肯锡认为,历史目录学并非像阿特金森或者鲍尔斯所言,不属于目录学。恰恰相反,面对这样的研究,所有目录学都是历史目录学。在这个层面上,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理论和书籍史(histoire du livre)、目录学是相通的^{[3]5}。

5 结语

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极大地拓展了实物目录学的研究范畴,将书籍的物质形态与文本意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二十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注重读者、物质实体和意义的书籍史研究的新风尚”^[21]。这个新风尚由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等人进一步发展。夏蒂埃对读者阅读活动的研究,重心在于读者如何认识和使用文本。他一方面强调读者所属阐释社群的阅读规

则,另一方面强调文本形式的作用。他主张文本的意义正是通过形式被读者(或听众)接受,“形式会产生意义,当借以呈现内容以供解释的物质形式发生变化时,即使一个固定的文本也会被赋予新的意义和本质(being),或者说身份(statut)”^[22]。复原文本的物质形态并研究其如何影响意义的生成是阅读行为研究中的重要部分。罗伯特·达恩顿评价麦肯锡是“目录学界的马丁·路德”,称“他的离经叛道并没有颠覆目录学,反而使它重生了”^{[14]156}。他在研究印刷术和印刷书的影响时,提出了一个“交流圈”理论。这个交流圈中包括作者、出版者、印刷者、销售商、读者等,他们都是影响图书生产、出版、阅读等各环节的因素。

除了对目录学和书籍史研究产生影响,麦肯锡的理论对当时的文学批评理论也提出了修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领域,出现了多个重视研究作品本身的理论,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这些理论大多认为作品是一个自足的实体,独立于现实、作者和欣赏者之外。在对文本进行解读时,或者是将文本孤立起来,隔绝外部因素,或者是集中关注文本与某一个因素的关系。这种理论无法全面展示文本的内在意义的结构和关联^[23]。“文本社会学”将写作、设计、印刷、阅读等环节与文本意义联系起来,强调作者、读者以及文本的形式等因素在文本意义的形成和理解中的作用。这一理论对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等批评理论提出了挑战。

麦肯锡不仅以怀疑的精神改造了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且证明了目录学在文学史、文化史等学术领域中的独特作用。他宽广的研究视野和学术实践,对欧美的目录学、文学批评,以及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1] 喻琴. 互文性:文本社会学的理论之核[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97-99. (Yu Qin. Intertextuality: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ext sociology[J]. 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8(4): 97-99.)
- [2] 李金云. 保罗·奥斯特小说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92. (Li Jinyun. A study of Paul Auster's

- novels[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92.)
- [3] McKenzie D F.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埃斯卡皮. 文学社会学[M]. 王美华, 于沛,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16-17. (Escarpit R. Sociology of literature[M]. Wang Meihua, Yu Pei, trans.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7: 16-17.)
- [5] 王治河. 福柯[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32, 167-168. (Wang Zhihe. Michel Foucault[M].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ress, 1999: 32, 167-168.)
- [6] Iser W. The reading proces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2, 3(2): 279-299.
- [7] 戴联斌.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研究理论和方法[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 79. (Dai Lianbin. From history of the book to history of reading[M]. Beijing: New Star Press, 2017: 79.)
- [8] 戴维·芬克尔斯坦, 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 书史导论[M]. 何朝晖,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28. (Finkelstein D, McCleery A. An introduction to book history[M]. He Zhaohui,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28.)
- [9] 赫伯特·斯宾塞. 社会学研究[M]. 张宏晖, 胡江波,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44. (Spencer H. Study of sociology[M]. Zhang Honghui, Hu Jiangbo,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1: 44.)
- [10] 张周志. 现当代西方哲学原典导读[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194. (Zhang Zhouzh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lassic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M].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15: 194.)
- [11] McKerrow R B. 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 a study in editorial method[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7.
- [12] 盛文林. 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学说[M].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117-118. (Sheng Wenlin. Important doctrines in human history[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2012: 117-118.)
- [13] 彭斐章. 目录学教程[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Peng Feizhang. Course of bibliography[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4.)
- [14] William P E. Bibliographical method: an introductory survey[M]. Cambridge: James Clarke, 1969.
- [15] Malclès L N. Manuel de bibliographie[M].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3: 7.
- [16] 瓦里. 实物目录学对了解近代出版品的贡献[M]//韩琦, 米盖拉. 中国和欧洲: 印刷术与书籍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155. (Varry D. Contribution of material bibliography to understand modern publications [M]// Han Qi, Bussotti M. China and Europe: history of book.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8: 155.)
- [17] Bowers F. Bibliography and textual criticism[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41.
- [18] Tanselle G T. Bibliography and science[J].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1974, 27(2): 55-89.
- [19] Bowers F. Bibliography, pure bibliography, and literary studies[J]. Th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52, 46(3): 186-208.
- [20] Atkinson R. An application of semiotics to the definition of bibliography [J].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1980(33): 54-73.
- [21] McDonald P D, McKenzie D F. Making meaning: "Printers of The Mind" and other essays[M].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7.
- [22] Chartier R. 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tory, language and practice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85.
- [23] 降红燕. 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管窥·前言[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 7. (Jiang Hongy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in 20th centu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M].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6: 7.)

李明杰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李瑞龙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 430072。

(收稿日期: 2019-09-04; 修回日期: 2019-11-09)